

无 备 则 败

（萧惠）

西夏皇帝李元昊（亦称赵元昊，又名曩霄，即夏景宗，党项族人）于宋仁宗（赵祯）庆历八年（公元1048年）正月，因纳原许给宁令格（为曩霄第五夫人雅尔氏所出，曩霄以其貌类己，立为太子）为妻的玛伊克氏为新皇后，被宁令格剺鼻而死。宁令格匿于黄芦（夏官名）鄂特彭家，又为鄂特彭所杀。鄂特彭遂立元昊与之私通的裕勒且妻阎氏（曾被雅尔氏出之为尼，号密藏大师）为太后。以阎氏（史称密藏氏）所生元昊之遗腹子（元昊死后三月而生）谅祚为主，西夏政权因此落入密藏氏之手。

当时，西夏太后主政，诸将不和。是年十一月，辽主“遣使括马”，准备乘隙进讨西夏。与此同时，辽主又欲于西部建城，命其东路统军使耶律色珍，“相地及造战舰”。耶律色珍经过筹划，聚能工巧匠造成楼船一百三十艘，上置兵，下立马，“规制坚壮”，辽主看了十

分满意。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之后，辽主即遣使以将伐夏来告宋廷。宋仁宗皇祐元年（公元1049年）六月，辽主以其韩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，赵王萧孝友、汉王特布为河南道副都统。辽军分三道：萧惠等率师为南道，行军都统耶律达和克所率部为北道，中道由辽主自己率领。是年七月，辽主以太弟重元、北院大王耶律仁先为伐夏前锋大举攻伐西夏。萧惠在伐夏作战中，“战舰粮艘，绵亘数百里”，浩浩荡荡，声震原野，颇有气吞山河之势。辽军进入西夏国境后，萧惠恃众轻敌，既不派侦侯去弄清敌人情况，又不作应付意外之虞的准备。在行进中，“铠甲载于车，军士不得乘马”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萧惠的部将无不感到忧虑，纷纷建言：请备不虞。

但是，作为辽军南路统帅的萧惠，对诸将的建议表示了漫不经心的态度。他对大家说：“我大军压境，蜂拥而来，谅祚必自迎车驾，哪里有功夫来顾我！无故设备，徒自弊耳。”好一个“无故设备”！这表明萧惠的轻敌麻痹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

后来，辽主所亲率的中路大军因故撤退。萧惠由于不知道这一情况，依然挥师大进。一天，他的营栅还没有建立起来，夏军就突然杀来。萧惠及其麾下，因为毫无准备，萧惠与其士卒连盔甲也没有穿戴起来，就仓皇退走。西夏军鼓噪而进，萧惠几乎被俘，士卒死伤不可胜计。

【点评】《孙子·行军篇》说：“兵非益多也，惟无

武进，足以并力、料敌、取人而已；夫惟无虑而易敌者，必擒于人。”萧惠的惨败正说明了这个道理。萧惠此次伐夏丧师的原因，关键在于他的轻敌麻痹。他认为辽军大至，西夏主谅祚就会伏首迎降。这显然是对敌情的错误判断。辽主率军先退后，他依然孤军深入，又疏于戒备，遂为夏军所败。这个教训是惨痛的，我们应该引以为鉴戒。



夜行赴难

（苏缄）

在广源州地区（今越南与我国广西省毗邻地区）建立南天国的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，于宋仁宗（赵祯）皇祐四年（公元1052年）四月，起兵反宋，攻陷邕州（今广西南宁市），执知州陈珙、通判王乾祐、广西都监张立等人，又沿江东下，连陷横、贵、龚、浔、藤、梧、封、康、端等九州，并进围广州，受挫后复还军邕州。

是年七月，侬智高率军进至广州城下。当初，魏瓘在广州筑城时“凿井蓄水，作大弩为守备”。侬智高攻城甚急，又断流水，但由于城池坚固，且井饮不竭，弩发击敌，侬智高军之势稍屈。宋·英州知州苏缄，在听到广州被围的消息后，即对其部将说：“广州与我英州相距不远，今广州危在旦暮，我们如若恬不往救，非义也。”于是，他便在英州搜集招募壮勇之士，共得数千人。他把州印交给提点刑狱鲍轳，自己率领这几千壮勇，夜行赴难，进至距广州二十里的地方立营扎寨。当时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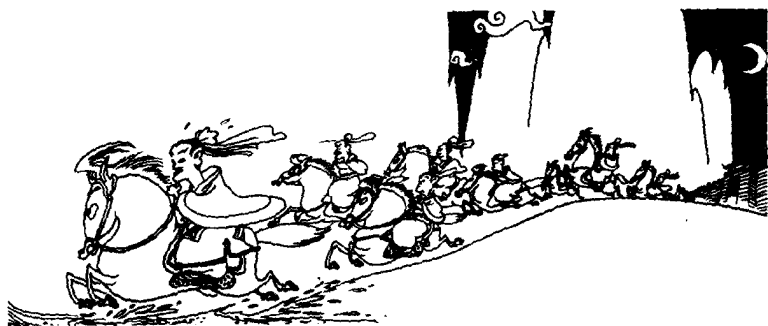
广州有个名叫黄师宓的进士，在侬智高军中给侬智高做谋主。苏缄知道这一情况后，派人将其父抓来，在阵前斩之以徇。侬智高闻之丧气。还有一些百姓，乘侬智高军围攻广州，剽掠为盗。苏缄捕得六十余人，并立即斩首示众。他驻兵广州城下，招怀侬智高军中的“驱胁诬误”者，使其重操故业者，共有六千八百余人。这就大大减杀了侬智高军的锐气。

侬智高围广州日久，战数不胜。于是，便集中战船数百，急攻南城，企图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。番禺令萧注，在侬智高向南城发起攻击时，就从城中突围出来，招募了海上强壮之士二千余人，乘坐海船，集结于西江上流。侬智高军向南城发起攻击后，突然飓风夜起。萧注便顺流而下，纵火烧敌船，顿时烟焰烛天，一江通明，侬智高军支持不住，四散奔溃。萧注即日发诸路援兵及民户牛酒芻粮，乘胜相继入城。

这时，转运使王罕也自城外募民兵入城，进一步加强了广州的守备。侬智高屯兵于坚城之下五十七日，知难以攻拔，遂解围而去。

【点评】侬智高自攻陷邕州后，沿江东指，诸多州县守将纷纷弃城而走。这表明北宋王朝的武备已经废弛到何等地步。侬智高在广州受挫后，主动撤围，还军邕州，这说明此人在军事上还是颇有见识的。在侬智高进攻广州的作战中，当然也遇到了一些抵抗，最重要的就是英州知州苏缄和番禺令萧注。他们以天下安危为己任，

临危不惧，招募壮勇，夜行赴难，这种精神对于军人来说是很可宝贵的。古兵书《司马法》有一段名言：“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”。宋王朝当时外患内乱不断，国家很不安宁。但是，自从与契丹（辽）有了“澶渊之盟”（公元 1004 年）之后，即废弛武备达四五十年。这次南方又起变乱，北宋王朝的统治，从此就更加岌岌可危了。



乐 饮 误 敌

（狄青）

宋仁宗（赵祯）皇祐四年（公元1052年）九月，朝廷接受宰相庞籍的推荐，以枢密副使狄青为将，率军进讨侬智高叛军。十月，诏鄜延、环庆、泾原路“择番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，各五千人”，赴广南行营，归狄青指挥，并令广南将佐皆归狄青节制。皇祐五年（公元1053年）正月，狄青率部与知桂州孙沔、知秦州余靖部会师，自桂州进至宾州。此时，宋军屡为侬智高军所败，军势大沮。

在向宾州进军时，狄青告诫诸将说：“无得妄与贼斗，听吾所为。”意思是要大家不得轻举兵戈，要按狄青的运筹行事。广西铃辖陈曙在金城驿曾为侬智高所败。进至宾州后，他恐怕狄青独建奇功，便乘狄青尚未到达，就以步卒八千向侬智高军发起进攻，在昆仑关，又被侬智高军打败。

狄青获悉此情，勃然大怒，对诸将说：“令之不齐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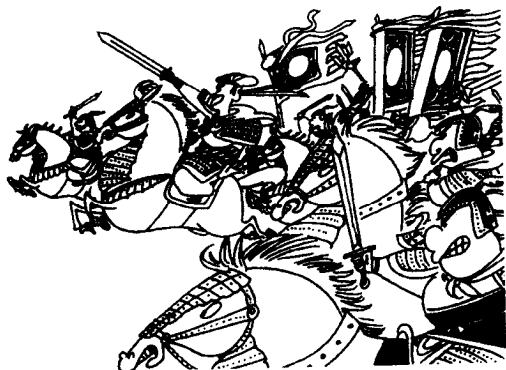
兵所以败。”他把大家召来，抓起陈曙及陈曙部将袁用等三十二人，“按所以败亡状，驱出军门斩之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孙沔、余靖也都相顾愕然。余靖曾经迫陈曙出战，便离开坐席对狄青说：“陈曙失律，也是我余靖的节制之罪。”狄青回答说：“舍人文臣，军旅之事非所任也。”诸将听了无不股栗。

狄青在杀掉陈曙等人之后，便按兵不动，并且征调十日军粮以供军需。敌谍者侦知此情，便向侬智高报告说，宋军不会立即进击。第二天，狄青却突然挥师大进，他自己亲率前军，以孙沔部为次，余靖率后军，一昼夜时间即进至昆仑关下。时值上元节（即农历正月十五），狄青便下令军中，张灯结彩，烛光照天，“首夜宴将佐，次夜宴从军官，三夜享军校”。头一天夜里，“乐饮彻晓，次夜二鼓，青忽称疾，暂起入内；久之，又谕孙沔主席行酒，少服药乃出，数劝劳坐客”。这样，一直宴饮到天明，诸将佐都不敢退席。“忽有驰报者，云‘三鼓已夺昆仑关矣！’”

原来，侬智高谋知狄青在关下“乐饮彻晓”，遂疏于戒备。第二天夜里，风雨交加，狄青乘机率军度关，看到敌军毫无戒备，便高兴地说：“敌不知守此，无能为力矣。彼谓夜半风雨，吾不敢来也。”遂出归仁铺列阵对敌。侬智高获悉宋军已轻取昆仑关，便倾巢而出，“列三锐阵以拒官军，执大盾、标枪、衣绛衣、望之如火”。狄青率“蕃落骑兵，张左右翼，出贼后交击，左者右，右者左，已而左者复左，右者复右，贼众不知所

为，大败走”。依智高在兵败之后，狼狈复趋邕州。狄青挥师大进，依智高见大势已去，便“夜纵火烧城遁，由合江入大理国”。

【点评】归仁铺之战是狄青征讨依智高的关键一战。在这次作战中，狄青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。他严于治军，采取乐饮惑敌之术，巧取昆仑关，决战归仁铺，一举而胜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细加回味的东西。



机断而胜

(贾逵)

狄青率军与侬智高在归仁铺决战时，他明令诸将“不待令而举者斩！”就是说，没有命令而出击者，要按照违犯军令的行为斩首。

当时，狄青以右班殿直张玉为先锋，如京副使贾逵将左，西京左藏库副使孙节将右。双方拉开战幕后，西京左藏库副使孙节在与敌搏斗中死于山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集结待命的如京副使贾逵想：“我所率领的忠敢、澄海军都是一些士兵，已经多次被敌围困而受挫，如果再等待命令，必为敌所逼迫。况且兵法有言，先据高者胜”。于是他便不等狄青的出击命令，就引军向一个山头疾趋而去。当他率军刚刚占领山头，侬智高军就蜂拥而来。这时，贾逵便率军从山头上拥众而下，挥剑大呼，突然杀向敌阵。

侬智高军遭此突然打击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，被贾逵部断为二阵，只有招架之势，而无还手之力。右班殿直张玉率部突出阵前，狄青指挥的蕃落骑兵也从敌阵后出现。侬智高军腹背受敌，前后被击，遂大败而溃。

归仁铺大捷后，贾逵亲自来到狄青帐前请罪。狄青看见贾逵，很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臂说：“违令而胜，权也，何罪之有！”意思是，你虽然违背了我的军令，但却取得了胜利，这是你善于以权制胜的表现，还有什么罪过可言呢？

《吴子·治兵第三》说：“若法令不明，赏罚不信，金之不止，鼓之不进，虽有百万，何益于用！”这里讲的是法令严明对于军队作战的重要性。在归仁铺之战前，狄青就果断地处决了违犯军令败军丧师的广西铃辖陈曙等人。从治军的角度看问题，狄青处决陈曙等人是完全正确的。但是，一切都要从战场的实际出发。归仁铺之战中，贾逵的“引军疾趋山立”，一是根据兵法原则，“先据高者胜”；二是其军“数困易衄，苟待令，必为贼所薄”；三是西京左藏库副使孙节已战死山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贾逵当机立断，果断地决定“不待令而举”。这样做于全局有利。从后来战役发展看，贾逵的“不待令而举”，是完全正确的，成为归仁铺大捷的关键一着。因此，在取得胜利后，贾逵虽登门负荆请罪，但狄青并没有处罚他。狄青能够这样做，确实表现了他的大将风度。

【点评】我们是主张坚决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的。没有这一条，各行其是，军队就会成为一盘散沙。但是，我们也不主张机械地执行命令，而提倡从实际出发的机断专行。贾逵所为就属于这一范畴。狄青讲的“违令而胜，何罪之有”，也是孙武所说的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的实际应用。对于这个问题，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，否则，在战争中就会贻误战机

以 静 镇 之

(张方平)

宋仁宗至和二年（公元 1055 年）正月，朝廷任命的益州知州还未出京，而原益州知州程戡已先卸任进京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当时，益州的军政大事，程戡临时交代给转运使高良夫负责。

就在新命益州知州张方平尚未到职的时候，西南夷的邛部川首领，“妄言蛮贼侂智高在南诏，欲来寇蜀”。一时益州地方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恐不安。摄守事的转运使高良夫听说后，即“亟移兵屯边郡，益_州额外弓手，发民筑城，日夜不得休息，民大惊扰”。就是说，高良夫听了侂智高在南诏（即大理国，今云南省境内），欲发兵侵蜀的谣言，不作分析，就信以为真，急忙调兵进屯边郡，还增加额外的弓手，征集百姓筑城备敌，弄得蜀地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。朝廷获悉这一情况，便诏命张方平迅速赴任，“且许以便宜行事”。

张方平临行前，向朝廷上书说：“南诏去蜀两千余里，道险不通，其间皆有杂种，不相役属，安能举兵与（依）智高为寇哉！此必妄也。臣当以静镇之。”可以说，这是对当时情况的正确分析和判断。张方平首先从地理条件上分析了依智高寇蜀实属子虚乌有。他的根据是“南诏距两千余里，道险不通”。接着他又从民族情况上进行了分析，即所谓“其间皆杂种，不相役属”。就是说，这些地方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，他们彼此之间又没有“役属”关系，怎么会举兵与依智高为患呢！于是，张方平得出结论说，依智高自南诏“欲来寇蜀”的消息，一定是蛊惑人心的谣言，即“此必妄也”。根据这样的分析和判断，张方平决定采取“以静镇之”的方略。

张方平在赴任途中，遇到调往边郡的戍卒兵仗，他即下令他们返回原地。到达益州后，即对邛部川部落首领说：“寇来，我自当之，妄言者斩！”并且全部散遣所征调的戍卒兵仗，罢筑城之役。到正月十五上元节时，下令城中张灯结彩，城门三日不闭。人心也就逐渐地安定下来了。

不久，发现邛部川的翻译是造此谣言的首谋者，便立即抓起来，“梟首境上”，同时把译人的余党，流放到湖南，益州之心也安定了。

【点评】张方平的“以静镇之”的方略，表现了他军事上的深谋远虑。他不轻信谣言，对发生的事

情作客观的分析，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和判断。这样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很有意义的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张方平其人在军事上还有什么成就，史书记载不多。但从他的这个“以静镇之”的方略来看，对我们加强谋略修养还是很有启迪的。我们的指挥员，无论是在平时工作中，还是在未来战争的战场上，绝不可惑于人言，使自己的“方寸”首先乱了起来。对于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“为什么”，冷静地进行综合分析，力求得出正确的判断，从而使自己的决策、决定符合于客观的实际。

郭 谠 议 边

(郭 谠)

宋仁宗（赵祯）时的西上阁门使、英州刺史郭谠，在兵器上曾有诸多发明创造，有如鹿角车、陷马枪、独辕弩、拒马车等等，对于提高当时军队的作战能力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仁宗嘉祐五年（公元 1060 年）五月，郭谠还给朝廷上了一个名叫《平燕议》的奏折，对于宋王朝的北部边境防卫建设，提出了很有远见的意见。他说：“自瓦桥至古北口，地狭民少；自古北口至中京，属奚契丹；自中京至庆州，道旁才七百余家。盖契丹（即辽国）疆土虽广，人马至少，倘或南牧，必率高丽、渤海、达达、墨水、女真、室韦等国会战，其来既远，其粮匮乏”。根据这种情况，他提出对付契丹（辽军）南犯的主要作战方针应该是：“以近待远，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。”他说：“得敌自至者胜，先据便地者佚。”为此，郭谠建议朝廷，要执行仁宗庆历年间（公元 1041—1048 年）提

出的“合众河于塘泊北界以限戎马”的策略，然后，再根据真宗年间（公元1004—1007年）的故事——“屯兵自守”。他还算了一笔账：在北部边境屯步卒二十万，骑兵三万，强壮三万，“岁计粮饷百八十三万六千斛”。这样的数量，郭谠认为，“及旁河郡邑可由水运以给保州应援”。给这些军队配“拒马车三千，陷马枪千五百，独轘弩三万，分选五将统率”。他还“毛遂自荐”：“臣可以备其一”。

北部边防作了上述那样的部署之后，辽军“来则战，去则勿追”。郭谠认为“幽州粮储既少，属国兵不可久留，不半年间，当遁沙漠”。那时，朝廷就“进兵断古北口，塞松亭关，传檄燕蓟，燕南可定”。

这本来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巩固边防、收复失地的战略方针，可是宋仁宗这位封建皇帝看了之后，只是“壮其言，诏置独轘弩二万”。后来，虽然又命郭谠担任“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及检内军器库兵仗，下南北作坊，以完军器”，但对于郭谠的“屯兵自守”，收复失地的宏图大略却置之度外，不作任何部署。

【点评】郭谠从当时宋辽斗争的客观实际出发，提出上述战略性措施是很难得的。特别是他在这篇《平燕议》中提出的“得敌自至者胜，先据便地者佚”，以及敌“来则战，去则勿追”等作战思想，今天看来，也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所谓“得敌自至者胜”，讲的是“以近待远，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”。这

和《孙子》兵法中所讲的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”的思想是相通的。在边境斗争中，我们不去搞扩张，不主动地去进攻别人，但是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，敌“来则战，去则勿追”。这样，我们就常占主动，真正做到有理、有利、有节。我们当然不必苛求古人，但是宋仁宗如果当时能够采纳郭谠的建议，后来的斗争形势一定会变成另外一种格局，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也许会是另一种情况了。俗话说，“一言兴邦”。可见，作为军事领导者虚心接受部属的真知灼见多么重要。